

■ 学前教师发展

身份区隔与认同危机：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 保育员职业价值研究

蒋烨琳^{1,2}, 王国超¹

(1. 贵州民族大学教育学系, 贵州贵阳 550025, 2. 凯里市第四幼儿园, 贵州凯里 556000)

摘要: 基于GZ省Q自治州11所省级示范幼儿园保育员的调查数据和25名保育员的访谈内容,探讨了保育员的职业价值问题。研究发现, Q自治州的保育员在外部对保育员职业价值的确认下,遭受了身份区隔,进行自我归类、群体比较后内化区隔,保育员内部得出保育员职业价值较低的结论,继而产生了职业认同危机。若要提升保育员的职业认同,需回到保育价值的逻辑起点,重塑保育员职业的本体价值和工具价值,充分发挥保育员“承接家庭教育”“链接母亲与教师身份”“联通儿童前台与后台生活”的本体价值,保障其“专业地位”“薪资待遇”“岗位职称”等工具价值。

关键词: 职业价值; 保育员;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 G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23)05-0097-10

PDF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23.05.012

Identity Segregation and Crisis of Identity: A Study of the Professional Values of Caregivers in the Context of Quality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JIANG Ye-lin^{1,2}, WANG Guo-chao¹

(1. School of Educ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Guiyang 550025, China;

2. Kaili City Kindergarten No. 4, Kaili 5560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ssue of childcare workers' professional values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caregivers in 11 provincial model kindergartens in Q Autonomous Prefecture, GZ Province and interviews with 25 caregivers. The study found that caregivers in Q Autonomous Prefecture suffered from identity compartmentalisation, internalised compartmentalisation after self-categorisation and group comparison, and caregivers internally concluded that caregivers had low professional value, which in turn led to a professional identity crisis, in response to external confirmation of caregiver professional value. In order to raise the level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caregivers, it is necessary to return to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childcare, to reshape the ontological and instrumental values of the caregiver profession, an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ontological value of the caregiver's role as a 'provider of education to families', a 'link between motherhood and teachers' and a 'link between the front and back of the children's life', and to secure their instrumental values like "professional status", "salary" and "job title".

Key Words: professional values; caregivers; identity

一、背景与问题

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要专业的教

师作为重要保障。因此,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题中要义^[1]。其中,保育员作为影响幼儿成长的重要他人,是幼儿园师资队伍

收稿日期: 2023-03-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BSH054); 贵州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2022A006)

作者简介: 蒋烨琳,女,侗族,贵州镇远人,贵州民族大学教育学系硕士研究生,凯里市第四幼儿园教师,主要研究方向: 学前教育师资培养,乡村学前教育课程; 王国超,男,苗族,贵州丹寨人,贵州民族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学前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人类学。

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幼儿园保教一体化水平、师资队伍稳定 and 高质量发展。但究其专业水平、地位作用而言,保育员是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中的短板。因此,保育员群体理应受到学界的重视。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将保育员定位为需积极承担起配合主班教师做好配班工作的教育者角色^[2];《“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指出,“增强师资培养培训力度”是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3];《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还明确提到,“要坚持保教结合”和“保育、教师队伍建设是进行保育教育质量评估的重要内容”^[4]。无论是保育员还是专任教师,都是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所需的人才,是有效促进保教结合,推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群体。因此,提升保育员的质量和稳定性也成为了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现实的幼儿园工作中,我国保育员处于教育“边缘人”的困境由来已久。受政策法规标准滞后、专业制度匮乏、职业声望及待遇低、人员流动性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5-8],我国公办幼儿园的保育员长期处于教育“边缘人”的身份困境,保教一体化受到阻碍,成为幼儿园师资队伍质量发展的瓶颈。然而,保育在幼儿成长发展和幼儿园教育质量提升中不可或缺,保育是家庭养育功能在幼儿园场域的延续,保教并重的基本原则应首先重视保育功能,遵循保育为重,教育在后的价值路径^[9];幼儿阶段生活、学习、游戏不可分割的特征使得保育在幼儿成长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保育是教师支持幼儿发展的直接方式,更是进行生活教育的最佳途径^[10];幼儿教育的使命不在于与其他学段相似意义上的教学与学习,而在于幼儿内发性精神成长的保育^[11]。当前幼儿园教育实践中,“保教分离”“重教轻保”的理念仍有形或无形地存在于大众、行政管理人员、幼儿园一线教育工作者的观念和行為中。鉴于此,重新审视保育员的职业价值对实现保教一体化与推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保育员正确认识职业价值对保教一体化和学前教育质量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的保育员多以幼儿园自主招聘的形式上岗,学历门槛低、专业要求低、工资低成为该行业的特

征。保育员对职业价值的认知,影响其角色定位、角色行为和角色情感^[12],与存在职业价值偏差的保育员相比,具有正确职业价值认知的保育员具有丰富、综合的角色定位,能建构正向的职业信念,走出“保洁员”的舒适角色定位,从教育“边缘”走入教育“局内”,有效促进幼儿的发展和保教一体化进程。相反,对职业价值存在认知偏差的保育员,在面对越发专业化的需求和越来越多的工作量时,选择与专任教师划分界线,以教育工作“局外人”的身份自居,产生对自身职业的认同危机,进而出现妥协、抗拒和逃离等一系列贬低自身职业价值的行为,严重影响了保教一体化和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进程。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不少幼儿园的保育员将保育员职业作为一种过渡性职业或“养老”职业,对配合教学等工作产生妥协或抗拒行为,甚至每年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保育员因工资待遇差、地位低、工作量大或专业性压力大等原因选择离职,表明该地区保育员在面对外界的身份区隔下,普遍认为保育员的职业价值较低。

从业者的职业价值认知是职业认同的一个重要维度^[13]。同样,职业认同程度也影响其对职业价值的认知。教师职业认同程度高能使其投入积极的职业情感和态度。有学者通过对英国和澳大利亚中小学教师的研究认为,教师职业承诺的关键是基于对职业价值的认同感^[14]。

职业认同源于泰弗尔和特纳的社会认同理论,指个体对自身职业价值的认知,以及对自身从事的职业与某个职业群体的情感态度相统一的程度,即是否将自己定义为某一职业群体并具有该群体的特征^[15]。教师职业认同是教师对职业价值与教学经验进行持续解释与再解释的动态过程^[16]。

已有研究对教师、保安、新闻工作者等群体的职业价值和职业认同程度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鲜有研究关注保育员这一幼儿园场域中的特殊群体,那么这些适用于其他群体的相关研究,是否适合保育员群体呢?

为了更好地探析Q自治州保育员对自身职业价值的认知状况及为何保育员呈现出认为自己职业价值较低的现状,笔者从保育员的主体视角出发,以保育员的职业认同为中介,构建“身份区隔——认同危机——职业价值”的解释逻辑。具体而言,即使用定性研究方法探寻保育员职业价值

的机制链,深入解析外部的身份区隔如何通过影响保育员的职业价值,造成其职业认同被破坏,最终重塑保育员职业的本体价值和工具价值。

二、数据与方法

定量研究只能对事件可量化和较为表层的部分进行测量,而无法深入、细致地探索事件的具体样态^[17] 472-473。大规模的定量调查无法解释保育员产生认同危机深入的内部原因,无法还原保育员理论中的职业价值和现实中的职业价值之间出现鸿沟的证据链。当前,尚未见保育员职业价值相关的定性研究。因此,笔者以“定性研究”为方法,重塑保育员职业价值。访谈是以口头谈话的形式从被访谈者那里收集资料,可以了解受访者的情感、观念和日常行为^[17] 169,采用深度访谈的形式能更好地从保育员本体视角出发,聆听“保育员的声音”,同时深入了解幼儿园内部多方主体对保育员职业价值的观点。

首先,对保育员所在地区人社局和教科局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走访,而后收集 11 所省级示范幼儿园主班教师和保育员的相关数据,厘清保育员的工资待遇和职业价值认知现状,有利于总体反映保育员和幼儿园其他群体对保育员职业的看法。其次,为了更好地了解保育员产生职业认同危机的原因,探寻现实生活中保育员职业价值的建构现状,我们在不同县市的省级示范幼儿园随机选择了 25 名保育员进行一对一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在整理访谈资料的过程中已将访谈者的身份信息进行匿名编码。访谈参与者的年龄从 22 岁到 49 岁不等,工作年限从 1 到 8 年不等,每次访谈平均持续 30 至 60 分钟。从保育员本体视角出发,深度了解被访保育员对自身的职业认同和职业价值建构现状。

三、区隔的“隐蔽在场”:外部对保育员职业价值确认下的身份区隔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将保育员职业定义为“在托幼园所、社会福利及其他保育机构中,从事儿童基本生活照料、保健、自理能力培养和辅助教育工作的人员”^[18] 3。从上述定义中可看出,保育员是幼儿园场域中的“教育边缘人”,其职业价值仅在辅助教师完成幼儿园的教育教学工

作,而不是一名专业的教师。外部职业价值的确认下,随即带来了保育员的身份区隔。身份区隔是指在同一或相似场域的共同体,按照一定的划分逻辑将共同体中的成员进行等次和类别的划分,同时在不同的身份类型下规定其享有的不同地位、责任和权利,进而形成不同的身份群体,产生共同体中身份的区隔^[19]。“编制制度是我国教师人事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制度,在教师队伍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也是教师职业吸引力的重要来源。”^[20] 国家几乎没有关于保育员编制、岗位和职称方面的明确规定^[5]。现实生活中“重教轻保”现象的长期存在,导致了专任教师地位高于保育员地位的局面,前者以国家编制教师的身份存在,后者难以突破编制的束缚,只能以“临聘”“合同制职工”的身份存在^[6]。在幼儿园,编制不仅意味着有保障的待遇和工资,更代表着专业身份、专业技术岗位的被承认,是象征着“专业性”的重要符号。公办幼儿园场域中,保育员与专任教师的身份区隔同时具有显性和隐性的双重区隔,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维度。

(一) 工资收入

体现在显性层面的身份区隔,最突出的就是工资收入。幼儿园一个班级的师资配备通常由两名专任教师和一名保育员组成,这种称谓上的不同也代表了工资收入的差异。数据显示,保育员的月均工资远低于专任教师工资。专任教师(初级职称)每月实发工资为 4000 元左右,而保育员实发工资不到专任教师的一半,每月实发工资为 1300 元左右。除此之外,专任教师还有绩效工资、奖励性绩效工资等。通过访谈发现,一位已经在省级示范幼儿园工作十年的保育员每月拿到手的工资也仅为 1730 元。

我现在拿到手每个月是 1300 元,跟我们班老师肯定是有很大差距的,小 W 老师刚工作两年,已经拿 4000 多的工资了,我们班 Y 老师工资就更高了,因为她的工作年限长嘛。(7-KL-5-GZ-T)

我们幼儿园保育员拿到手的工资一般都在 1300 左右,我算是干得比较久的,在这个幼儿园工作 10 年了,虽然进了教育局的工勤岗,但拿到手的工资也只有 1730 元,老师拿的绩效,我们是没有的。(7-KL-8-GZ-T)

（二）其他福利待遇

当前,专任教师享受的是五险一金的福利待遇,而保育员最多享受三险,两者在保障程度上具有较大差距。此外,Q自治州的政策越来越关注教师待遇的保障和提高,但目前还没有关于保育员待遇提高的政策。

我们保育员一般只有三险,跟老师的五险一金没法比,有些幼儿园都没交呢,我们的待遇上跟老师比差的太多了,但是我们平时其实也帮老师干好多活,没办法,说是要配合嘛。(5-ZY-2-FL-T)

（三）专业发展和职称晋升

个人在职业生涯中的成长和价值需要专业发展的平台和途径来实现。当前,我国与保育员相关的专业发展仅有“保育员资格证”。Q自治州鲜有保育员的大型培训,且无保育员职称评审制度,幼儿园内部对保育员的培训也较少且多为卫生保健相关内容。

我们一般在进幼儿园之前会考保育员证,但其实以前也有很多保育员没考证,先来工作了好几年才考证的。培训比较少,县里面的,我听说前两年有一点,但保育员没有去,是让我们保健医生去的,平时在幼儿园主要给我们培训传染病的预防,特别是新冠病毒、手足口病这些。(5-RJ-4-JS-T)

我还没听说过保育员可以评职称的呢,我们就是年限长、干得好的话可能可以转成工勤岗,这应该是我们保育员最羡慕的岗位了,但是听说这个很难,一般人也得不了,我们幼儿园就一个,工作了好多年,我可能坚持不了这么久,不去想这么多了,呵呵。(7-KL-3-JS-T)

（四）称谓不同与社会地位

身份区隔体现在有形的身份称谓与无形的社会地位方面。当前,在我国的幼儿园中,专任教师是负责教育教学的专业人员,保育员则是负责照顾儿童生活和保证儿童健康的“阿姨”。这种称谓和职责方面的不同,显现出鲜明的身份对比,专任教师是幼儿园教育中的“主角”,而保育员仅仅是一位配合教学工作的教育“边缘人”,进入不了教育的内部世界。称谓区隔的隐蔽下,带来的是身份区隔,身份区隔意味着专任教师和保育员两者具有较高或较低的社会地位。无论是在政策文件上,还是在幼儿园实践中,保育员都无法获得与专

任教师同等的发展条件,其在各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6],即所获得的社会地位与声誉也较低。隐蔽的社会地位区隔无形渗透保育员与教师、家长的日常交往中。保育员对此深感无奈和羞愧。

我是学幼儿教育的,因为暂时没考上工作,先来干保育员,刚来上班的时候,真的很不习惯有些家长教孩子叫我“阿姨”,感觉特别不尊重人,但又没办法。(6-SB-1-DW-T)

和亲戚、朋友说起自己在干保育员,还是会有点不好意思的。(6-CG-2-DW-T)

身份区隔使得保育员与专任教师群体分离,前者处于劣势地位,后者处于优势地位。保教并重、保教结合是幼儿园教育的基本原则,“并重”“结合”一说,究其实质而言,就是把教育的概念狭义化了,教育变成了“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实施的活动”的专有名词,而保育在幼儿园场域中则变成了“打扫卫生”的代名词,使得本就应该不分你我、统成一体的保育与教育工作越加出现分离的倾向。教育与保育工作的窄化定义也给专任教师和保育员贴上了无形的标签,专任教师是“学历较高”“专业的”“教育工作者”,保育员则是“学历低”“不专业的”“被淘汰者”。身份区隔背景下产生的身份标签,强化了“被淘汰者”的个人成败归因,“被淘汰者”做的就是一份打扫卫生的工作,之所以会做这份身份地位较低的工作是因为自己学历太低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将身份界定建立在不合理的保教工作区隔和非个人能力及实际贡献基础之上,成为保育员产生认同危机和定义自身职业价值低下的根源。

四、区隔内化与认同危机显现:“边缘人”群体遭遇

在本研究中,保育员在近乎固化的身份桎梏中,内化了岗位型构与他者注视下的身份区隔,长期处于劣势地位,在此情况下保育员产生了共同的认同危机。保育员职业认同危机实则是作为幼儿教育“边缘人”的保育员在职业价值确认下的一种困惑与挣扎。

（一）自我归类和群体比较下的身份桎梏

社会认同经历三个心理过程:社会分类即自我归类过程,社会比较即与其他群体进行各方面的比较过程,积极区分即寻求自尊源泉的过程^[21]。自我

归类是社会认同理论的一部分^[22],沿袭“同一性”的概念,主要回答我们是谁,与别人的区别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身份区隔下保育员的工资待遇、社会地位较低,通过与专任教师群体相比,他们深刻感受到自身群体所处劣势地位,面临难以逾越的身份桎梏。

天天都在说我们要配合教学的工作,说保育员的工作岗位很重要,只有我们配合他们才能达到他们说的保教结合的效果,但是实际上就是想让我们多干点教学的事情,说到底还是我们班老师的岗位要重要点。(5-TZ-2-GL-T)

从“我们”与“他们”的话语表达中不难看出,保育员是将自己与专任教师这个群体相区别的,认为自己跟专任教师是不同的,并认为自己的群体没有专任教师的地位和价值高。在实际的幼儿园生活中,保育员需要工作一整天,除了打扫清洁以外,还需要配合教师进行环境创设、课程实施、生活教育等,教师加班保育员也会跟着加班,一起协作做好班级事务,但是保育员的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却远远低于专任教师。与保育员的谈话中,明显能感觉到他们对自身职业待遇和工作过多的不满情绪。

很多人都坚持不下来,因为真的很累,本来中午应该保育员休息的,因为他们经常开会,我们就休息不了,要守睡。(5-ZY-4-GL-T)

我们要配合教学的工作有很多,他们搞环创时,我们得一起弄,他们教学时,我们也要配课,有时候又要做保育工作,又要来配合他们的工作,我确实有点忙不过来,帮他们做了,钱也不多一分,还特别少。有时候,我们也要教孩子们很多生活上的事,要教他们怎么取放餐具、打餐、洗手、如厕等等,但是老师一般不帮我们做卫生,他们确实也忙。(7-KL-1-GL-T)

保育员同时做了保育和教育的工作,却不能获得较高的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这种不合理的岗位型构使得保育员产生了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阻碍了他们对职业认同的发展,影响了他们对保育员职业价值的正确建构。

(二) 他人对身份“误解”的歧视知觉

职业认同是“自我”与“他者”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职业信念,其形成是一个互动性和建构性的过程。能力、业绩、认可是职业认同测量的三个

维度^[23]。因此,个人职业认同是其与他者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既取决于自身的能力与业绩,更依赖于他者对自我的认可程度。同样地,保育员在与他者互动的职业认同建构过程中,也有获得认可的需求,是否被他者认可不仅影响其职业认同的水平,也制约着其对职业价值的建构。在身份区隔的背景下,无论是在其政策型构还是幼儿园实践中,保育员都受到了不被认可的待遇。所以,保育员产生职业认同危机与其缺乏合理的社会认可关系十分紧密。

一方面,在政策型构与社会话语中,保育员并没有以应有的合理身份存在。“在后结构主义的观点看来,认同是通过语言来构造的。”^[24]《幼儿教育辞典》对“保育”一词的定义中,提到的主体为家长或保育人员^[25]⁶⁸;《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将保育员定义为“在托幼园、社会福利机构及其他保育机构中,辅助教师进行婴幼儿保健、养育和教育的人员”^[18]。从以上对保育员职业的文字语言界定中可以发现,保育员仅仅是协助人员,这意味着保育员的教育者身份在政策上还未达成共识。虽然保育对于3至6岁的幼儿来说,具有与教育同等甚至更高的价值,保育员也需要承担配合教学和进行生活教育的工作,但是保育员的教育者身份仍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明确认可。在各地保育员的管理制度中,保育员因为没有获得合理的教育者身份,在工资待遇、专业发展等方面对其与专任教师进行了区别对待,且保育员并无职称评定政策。在社会话语中也给保育员贴上了“学历低的”“不专业的”“能力不足的”等标签,因为他们有些是因为学历低或专业不好找工作而选择的保育员职业,有些是因为没有考上专任教师编制而选择相关职业进行过渡的“淘汰者”。在访谈中,笔者虽然以秉持尊重的原则称呼保育员为保育教师,但保育员仍习惯以“保育员、我们保育员”来称呼自己和自己的群体。身份区隔从他者角度以一种外部力量抹杀了保育员对自身教师身份的自我描述,他们对这些外在话语体系的适应和内化,使得他们将保育员职业定位为无能力的、教育边缘的非专业工作人员,并将这种对保育员职业不认同带入幼儿园工作中。

另一方面,在幼儿园教育实践中,保育员也感知到了歧视。职业认同是个体在与情境交互中

的现实建构^[26],我们需要深入了解保育员日常生活中的工作经历,探析这些经历是如何影响保育员的情感体验和职业认同的。在教育实践中,尽管保育员属于幼儿园中的工作人员,但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得到认可。

我和班上老师相处得还可以,就是有时候还是感觉他们说话不太客气吧,可能他们觉得自己是老师,比我们要好很多。(5-RJ-1-GL-T)

他们正式教师有个群的,有什么发奖金啊、分配福利的事,肯定就没我们的份,所以他们都是悄悄说的。(7-KL-2-GL-T)

今天要开总结会,划分了教师组、后勤组,我们就很无奈,也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组,后来问了主任才知道我们跟着后勤组开。(7-KL-1-GL-T)

身份区隔下的负面遭遇给保育员带来了持续的负面情绪体验,他们开始达成一种共识——干多干少都一样,这个行业没有职业发展前景,只是作为过渡行业暂时在这里工作而已,找不到职业的价值和意义。

你说嘛,我的这点工资是不是和清洁工的工资差不多,有时候就想不通,为什么教师的事情我们也要跟着做,还耽误我们正常的休息时间,叫我们加班,等我家孩子从这个幼儿园毕业了,我可能还是要考虑其他工作的。(5-TZ-1-GL-T)

我一般到点就下班啊,开放日结束后找家长写活动建议本来就是老师的事,喊我干我也没办法,我就喊家长代表帮忙收一下,我先下班走了。(6-CG-1-GL-T)

听说明年要搞示范幼儿园评估,我们都要加班,整整晚放假一个月,我这一个月的工资才600块,怎么生活,暑假打工的计划泡汤了,偷偷跟你说我最近都不想干活了。(7-KL-2-GL-T)

这种不符合保教一体化的身份歧视存在于保育员的整个工作过程。保育员不仅在工资待遇上处于劣势地位,其也被界定为一群工作不稳定、能力不足的教育边缘人,不仅受到学前教育行业话语体系的不公平对待,也普遍受到家长和社会的职业歧视。但是,在保育员自身看来,虽然他们清楚在这份工作中自己处于弱势地位,但自己并不是能力不足的个体,只是生活、家庭的原因导致他们被迫妥协,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有能力在未来某一行业中得到认可。

说实话,我才22岁,我本身也是学医的,虽然只是大专学历,但是我这两年会努力考证,以后还是做跟专业有关的工作要好一点。(7-KL-1-GL-T)

我今年刚毕业,是学应用心理专业的,今年没考上工作,边做保育员工作边复习,虽然这样很累,也争取明年考上吧。(5-SB-1-GL-T)

社会的负面评价和长期怀疑使保育员群体产生持续的负面情绪,致使身份区隔内化,保育员群体得出了保育员职业的本体价值仅为打扫卫生和照顾幼儿生活起居,工具价值为待遇低和无专业发展可能等职业价值较低的结论。

五、职业价值的回归重塑

职业价值是员工通过工作所想达到的成果,以及令人所满意的工作的构成要素,影响着个人的职业选择、职业认同程度和工作效率^[27]。职业价值包含两个维度:本体价值和工具价值。其中,本体价值是基于理想主义而言的,指职业属性与主体对其需要中的本质成分的关系,即对人和社

会发展的价值;工具价值则基于功利主义而言,指与职业本质属性无关的回报,即职业为个体带来的经济回报、地位、晋升等外在职业价值^[28]。本体价值和工具价值都是在社会符号互动的过程中与外部他人和内部自我进行交错互动而形成的。认同就是某一人向某一群体靠拢,以该群体的身份类型和职业价值要求自己的过程。保育员在形成职业认同的过程中与周围环境和人互动,遭遇了外部对保育员职业价值确认下的身份区隔,内化区隔后得出了保育员的本体价值和工具价值均偏低的结论,最终产生了职业认同危机。来自外部和保育员内部的职业价值确认导致了保育员职业价值的遮蔽,必须回到保育价值这一逻辑起点,重塑保育员的职业价值。

(一) 保育员职业的本体价值

1. 承接家庭教育功能

在幼儿园场域中,保育自然承接了家庭教育功能,起到了缓解幼儿入园焦虑,增强幼儿的归属感和安全感的重要作用。家庭的教育功能中,养育被认为是家庭首先需要承担的责任。保育员作为保育工作的实施主体,其职业的本体价值之一就在于承接家庭中教育者的角色,承担起幼儿园的

养育工作,帮助幼儿建立起对幼儿园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养育主要指照顾儿童的生活起居,即儿童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的琐琐碎碎。当幼儿入园后,面对生活琐事最多的无疑是保育员,虽然他们意识不到生活琐事是教育工作,却实实在在地承担着幼儿园的养育工作。

我虽然是打扫卫生的,但是孩子们不吃完饭,我也不好收碗啊,我们班是小班,孩子都吃得慢,吃得特别慢那几个小朋友,每次都是我喂完的。(5-ZY-1-JZ-T)

孩子们中午起床后,我整理好床铺,就来帮孩子们梳头发。因为下午只有一位老师带班,他要看着孩子们吃午点,然后组织吃好的那部分小朋友开展活动,所以我就来帮小女孩们梳头发,我还挺喜欢给他们梳头发的呢,很美。(6-SB-2-JZ-T)

除了直观的照顾以外,保育员还需要对幼儿生活习惯进行引导和教育。虽然绝大多数保育员在对幼儿进行教育时,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是教育行为,也存在无可奈何的情绪,但仍旧起到了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的作用。

每天要打扫很多次厕所的卫生,因为孩子们老是会尿在外面,为了好打扫一点,我也是经常教他们上厕所的时候应该怎么蹲或者站在哪里,教了厕所的卫生会好打扫一点。(6-SB-3-JZ-T)

小班的小朋友刚来的时候都不会擦屁股,家里面也不教,老师们也没空,一到擦屁股就是我的活,所以我还是教教他们,我自己轻松点。(6-CG-2-JZ-T)

更为重要的是承接家庭教育功能,接续家庭养育者在幼儿园中的养育责任,营造轻松、舒适、有爱的幼儿园氛围,才能让幼儿对幼儿园产生归属感和安全感。

我现在在填这个是最近生病的孩子的追踪表。就是孩子生病在家的情况跟踪,还有就是生病好了之后入园的表现,以及日常护理的方法等等。(7-KL-2-JZ-T)

如果有些孩子感冒了,他们会让我们多给孩子喝点水。拉肚子的孩子,家长也会说要注意他们上厕所。(5-ZY-1-JZ-T)

照顾幼儿在幼儿园的生活起居,看似只是保育员日复一日、十分琐碎的保育工作而已,但正是这些生活琐事承接家庭的育人功能。因此,保育

本身就是教育,保育员就是教育者。保育员职业的本身价值先于专任教师的教育价值,是幼儿顺利从家庭教育过渡到幼儿园教育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奠定幼儿在三年幼儿园生活中的温暖底色。

2. 链接母亲身份与教师身份

保育是与幼儿建立亲密关系的最佳途径,保育员担任了幼儿园中的母亲身份,其本身价值之二是链接了家庭中母亲功能和幼儿园中教师教育。与幼儿建立亲密关系,是开始进行幼儿园教育的根基,如何建立类似于家庭中幼儿与母亲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是与幼儿建立亲密关系的关键。这需要我们立足家庭教育的特点,思考幼儿何以建立起对母亲的强烈依恋和依赖。母亲是家庭中主要承担孩子喂养责任的照顾者,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是婴幼儿时期最重要的需要。“母亲身份”可延伸至非亲生父母子女组成的家庭中,或类父母子女互动场景的关系中^[29]。保育员作为幼儿园中幼儿的主要喂养者和与幼儿在幼儿园中生活琐碎事件中的主要互动者,在一定意义上模拟了母亲在家庭中与幼儿互动的内容和模式,承担了幼儿园中的母亲身份。保育工作不仅本身就是教育工作,而且有着狭义的教育工作所没有的特殊价值。与幼儿建立的亲密关系成为母亲养育和专任教师教育之间的良好链接。

我们班有个穿尿不湿睡午觉的小男孩,不爱说话,每次都是我给他穿尿不湿,所以平时他还愿意跟我说一点点话,平时活动的时候也愿意挨着我。(7-KL-4-JZ-T)

有个小女孩从来幼儿园就一直哭,是插班生,每天都喂她饭,她天天拉着我的衣角,跟在我屁股后面,跟我去端碗,跟我盛饭,还跟我上厕所。(5-TZ-2-JZ-T)

保育员在与幼儿的类父母子女关系场景的互动中,也能感知到自己与幼儿之间的情感互动,带入了情感劳动。情感劳动是指通过激发和抑制自己的情感来满足购买他们劳动力的客户^[30]。保育员在幼儿园工作时,需要控制自己的正面或负面的情绪,也与幼儿建立了依恋的情感,对幼儿不仅有身体上的照顾,更产生了感情上的呵护。

我有时候感觉我照顾这些孩子都比照顾我自己家的孩子还上心,就像自己亲手喂大的孩子一样。(6-SB-3-JZ-T)

刚刚送了一波孩子毕业,说实话舍不得,毕竟是自己从小班跟到大班的,他们来的时候,不会自己吃饭,不会擦屁股,不会收玩具,都是我一点点教他们的,现在一个个都长大了,离开我了。

(7-KL-5-JZ-T)

保育员与幼儿在幼儿园琐碎生活的互动中,不仅形成了单方面的幼儿对保育员的依恋,而且保育员也产生了情感劳动,形成了保育员与幼儿的双向依恋。由于保育员受到身份区隔的遭遇,在这段亲密关系中挣扎与徘徊。

我之前来当保育员是因为喜欢孩子,想着在幼儿园照顾孩子也算是老师,可是来了才知道,我们跟老师的区别可大了,工资暂且不说,我们的身份地位就是不受人待见的,有时候想想也没必要这么认真工作了。(5-TZ-1-JZ-T)

工资这么低,但是干着翻了好几倍的活,领导要求我们热爱幼儿、发现幼儿,要对幼儿有爱心、耐心,这么高尚的活,这么低的工资,确实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虽然觉得孩子很可爱,也爱他们,但就是觉得做这么多工作,还要对他们进行生活教育不值当。(5-TZ-1-JZ-T)

面对保育员与幼儿亲密关系中的投入与挣扎,应当正视保育员承担幼儿园中母亲身份的职业价值,消除外部职业价值确认下的身份区隔,祛除保育员母亲身份的挣扎,建立良好的双向亲密关系,为实施幼儿园狭义的教育工作做好心理铺垫。从保育员母亲身份这一职业角色来说,保育员的职业价值是专任教师的职业价值得以实施的前提和基础,链接了母亲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在幼儿园这种以生活教育作为主要教学手段的特殊场域中,保育员的职业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高于专任教师的职业价值。

3. 联通幼儿的前台生活与后台生活

符号互动理论研究者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以戏剧类比人生的方式,模拟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和社会生活^[31] 19-27。戈夫曼以“戏剧”比拟个人在社会互动中与外部他人和内部自我进行互动的过程,认为每个个体在社会互动中都扮演着某一“角色”,并拿着一定的“道具”,在进行“表演”。他将“表演舞台”划分为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据此,社会生活也可划分为“前台”与“后台”。依据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幼儿在班级中的一日

生活可以划分为需要迎合“成人常规”的前台区域和“自我满足”的后台区域。前台生活是在常规控制下,组织的各种教育教学活动,后台生活则是在教师忽视的时空下,展现出的流露天性的以儿童为主体的隐蔽活动,毋庸置疑的是后台活动更能体现和激发幼儿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母亲与孩子之间是“超熟人”社会,保育员与孩子之间是“熟人社会”,而专任教师与孩子之间则是“生人社会”。作为长期带领幼儿进行前台生活的专任教师来说,从意识和精力上都无法触及幼儿的后台区域,洞察幼儿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性活动,在幼儿的后台生活中,专任教师是较少进入幼儿后台的“陌生人”。但照顾幼儿生活起居的保育员,在不属于狭义教育的场地中和没有那么多狭义教育目的束缚的情况下,成为幼儿园中经常能够进入幼儿后台生活的成人,变成了幼儿后台生活中的“老熟人”。

厕所的卫生一般由我打扫,就会听到孩子们平时会在厕所说一些悄悄话,有一次我就听到他们要去什么秘密基地,好像是在操场的小蘑菇里,里面还藏了一些玩具。(7-KL-2-JZ-T)

有些小朋友会带糖果在书包里,然后就拿给好朋友分享。但是因为我们班的老师跟孩子们说过不准从家里面带糖果来学校,所以有几个小朋友就老是等Y老师带孩子们出去户外活动后,借在后面上厕所的理由,悄悄地在后面交换糖果。(7-KL-1-JZ-T)

同时,保育员作为一名幼儿园工作人员,也有引导幼儿社会性发展的义务。观察幼儿后台生活,通过加入或与教师合作融入幼儿后台生活的方式,联通幼儿前台生活与后台生活,同时发展幼儿“个体性”和“社会性”。

有一次,大班的小女生和小男生在厕所里面互相掀衣服,看对方的隐私部位,我就看到了这个事情,喊了几次不要这么做,但是没用。那天放学跟老师和家长说了这个情况,我们一起针对性知识给孩子们进行了普及,后来这种情况就慢慢减少了。(7-KL-3-JZ-T)

户外活动结束之前,我会把午点先拿回活动室,孩子们户外活动结束后,就坐在一起吃午点,但好几次都发现有几个孩子“提前偷吃”,G老师每次都会给他们强调要遵守规则。有一次,我提前

回来,发现那几个孩子洗手、喝水的动作真的很快,等了好久才和其他孩子一起吃午点。后来跟 G 老师说了这个情况,他们教学组好像还讨论了一下,后来就决定了让孩子自主取餐,不统一开餐了。(5-ZY-2-JZ-T)

保育员是常常活动在幼儿的“后台区域”照顾幼儿生活起居的成人,能走入幼儿的后台生活。在狭义的教育中他们是教育“局外人”,但在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中他们确是教育“局内人”,在幼儿和教师之间,其起到了中介作用,将幼儿的后台日常传递给沉浸在前台区域无法抽身的教师。因此,保育员职业的本体价值之三是联通幼儿的前台生活与后台生活。

(二) 保育员职业的工具价值

在保育员的实际工作中,保育员职业价值在保育员对现实工作的投入和挣扎中得到一定的体现,但由于身份区隔,其工具价值无法对应其本体价值,出现了本体价值高而工具价值低的困境,由此也导致了保育员的身份认同危机。因此,应根据保育的价值及保育员职业的本体价值衍生出保育员职业的工具价值。首先,改变保育员的称谓,将保育员称为保育教师,从显性层面消除保育员与专任教师之间的身份区隔;第二,将保育员真正纳入教育工作者的队伍,强化其专业地位,以专业的职前教育和岗位培训,制定职称晋升制度,提升其专业发展的空间和机会;第三,给予保育员与教师同等的薪资待遇,建立保育员工作和社会保障制度,使保育员能够凭借自己的教育专业身份来获取工作福利和待遇,在物质层面从教育“边缘”走入“局内”。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保育员职业的本体价值属于“道”的层面,强调职业本身的原有价值,而保育员的工具价值属于“器”的层面,即强调保育员职业存在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个体生存的利益价值。道和器是辩证统一的,本体价值是根基,工具价值是保障。只有当本体价值和工具价值同时具备时,才能实现“职业吸引力高——人才素质高——本体价值实现程度高——工具价值高——职业认同程度高”的良性循环。

六、总结与讨论

保育员在外界对保育员的职业价值确认下,

遭受了身份区隔,将区隔内化,得出保育员职业本体价值和工具价值均低的结论,进而产生了职业认同危机。保育员的职业认同危机不利于保教一体化的实现,影响教育高质量的发展。若要加强保育员的职业认同感,必须扭转外界与保育员内部对该职业的价值判断,提升保育员的职业价值。

保育员常被认为是一种过渡性职业,暂时没有找到符合自身专业的工作和方便照顾年幼的孩子是他们从事该职业的主要原因。在当前我国学前教育背景下,只要这种身份区隔存在,保育员的职业价值就难以得到改观,身份认同就难以得到提升,专业水平也难以得到提高。那么,想要提升保育员的专业水平,降低保育员的流动性,需回到保育价值的逻辑起点,重新确认保育员的本体价值和工具价值。充分发挥保育员“承接家庭教育”“链接母亲与教师身份”“联通儿童前台与后台生活”的本体价值,保障其“专业地位”“薪资待遇”“岗位职称”等工具价值,是提高保育员职业价值,增强职业吸引力,提升专业性和加强职业认同感的关键,也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助推保教一体化的有效举措。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研究样本量较小且无其他地区的对照样本,无法探寻我国不同地域保育员的职业价值认知情况和职业认同程度。第二,研究样本没有根据保育员的相关信息严格的类型划分。尽管保育员群体的职业认同与职业价值确认有关,但依据人口统计学类型不同,仍存在个体差异。本研究没有对教师的相关信息,如年龄、婚姻状况、生育情况、专业背景和文化背景做严格的统计和区分,故相关因素的影响差异并未得到完全地控制。第三,以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确实有效弥补定量研究的缺陷,但需承认,访谈无法深度进入研究现场观察真实情况,只进行一次访谈也无法充分了解保育员职业价值确认和职业认同随时间推移所发生的变化,故仍存在某些局限性。保育员的职业价值和职业认同是一个复杂的教育问题,有许多外部和内部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未来的研究期望能够纳入不同地域和不同类型幼儿园保育员的相关变量,全面探析保育员的职业价值和职业认同情况。此外,在纵向研究中持续跟踪保育员的职业价值和职业认同发展动态,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姚伟. 价值与路径: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幼儿园质量文化建设探寻[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6): 97-10.
- [2] 教育部.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EB/OL].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459.htm.
- [3] 教育部. “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7053/202112/t20211216_587718.html.
- [4] 教育部. 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EB/O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2/15/content_5673585.htm.
- [5] 岳丹丹, 于冬青. 幼儿园保育员队伍人口学特征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11省(市)的调查[J]. 上海教育研究, 2019(7): 61-66.
- [6] 武欣. 欧盟国家幼儿园助理教师专业化的现实困境与改革路径[J]. 外国中小学教育, 2019(7): 57-64.
- [7] 尚爽. 沈阳市保育员职业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D]. 沈阳: 沈阳师范大学, 2020.
- [8] 李姗泽, 杨文婧. 保育员素质及工作现状的个案研究[J]. 学前教育研究, 2007(5): 40-42.
- [9] 赵南. 学前教育“保教并重”基本原则的反思与重构[J]. 教育研究, 2012, 33(7): 115-121, 129.
- [10] 夏海. 保育质量是幼儿园办园水平的决定性因素[J]. 中国教育学刊, 2017(11): 101.
- [11] 苗曼. educate: 一个值得引入的幼教概念[J]. 学前教育研究, 2018(12): 28-38.
- [12] 刘星妍. 幼儿园保育员角色研究——基于社会角色理论[D]. 太原: 山西师范大学, 2021.
- [13] 王晔安, 郑广怀, 朱苗. 职业支持: 社会认同理论与职业认同的新维度[J]. 社会发展研究, 2021, 8(1): 52-75, 242.
- [14] Christopher Day, Bob Elliot, Alison Kington. Reform, standards and teacher identity: Challenges of sustaining commitment[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05, 21(5): 563-577.
- [15] Glen E Kreiner, Elaine C Hollensbe, Mathew L Sheep. Where Is the “Me” among the “We”? Identity Work and the Search for Optimal Balance[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6, 49(5): 1031-1057.
- [16] Maria Assunção Flores, Christopher Day. Contexts which shape and reshape new teachers’ identities: A multi-perspective study[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05, 22(2): 219-232.
- [17]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7.
-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保育员[M]. 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9.
- [19] 郝彩虹. 身份区隔: 生发于本土土壤的劳动管理策略——对某国有建筑企业地铁工地的个案研究[J]. 青年研究, 2014(2): 32-43, 94-95.
- [20] 李廷洲, 鄧庭瑾, 吴晶. 中小学教师编制的理论逻辑与治理思路[J]. 教育研究, 2022, 43(5): 139-148.
- [21] Tajfe H, Turner J C.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J].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2004(1): 277-293.
- [22] Seruya F M, Hinojosa J. Profess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in paediatric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the influence of practice setting[J]. Occupational therapy international, 2010, 17(3): 123-134.
- [23] Heidi B, Carlone A J. Understanding the science experiences of successful women of color: Science identity as an analytic lens[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2007, 44(8): 1187-1218.
- [24] Steadman A, Kayi-Aydar H, Stefan M V. From college composite-on to ESL: Negotiating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new understandings, and conflicting pedagogies[J]. System, 2018, 76(11): 38-48.
- [25] 王忠民, 等. 幼儿教育辞典[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4.
- [26] Goodson I, Cole A. Exploring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Constructing Identity and Community[J]. Teacher Education Quarterly, 1994, 21(1): 85-105.
- [27] Duffy R D, Sedlacek W E. The Presence of and Search for a Calling: Connections to Career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7, 70(3): 590-601.
- [28] Umut Kubat, Ayse Kuruuzum.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Value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tudies, 2009, 1(1): 37-48.
- [29] Julie Berebitsky. Like Our Very Own: Adoption and the Changing Culture of Motherhood, 1851-1950[J].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2002, 88(4): 1557-1558.
- [30] Ashforth B E, Tomiuk M A. Emotional Labor and Authenticity: Views From Service Agents. Emotion in Organizations (2nd edition) [J]. Sage, 2000(1): 184-203.
- [31] 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 冯钢,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 李亚卓]